

论王士禛与《分甘余话》

王 斌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分甘余话》是清人王士禛所撰写的一部史料笔记,内容记见闻和谈学问兼而有之。王士禛既受当时社会私人撰述风气影响,又通过个人主观努力,为后世留下了这部上乘之作,其内容极其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地理、民俗等多方面,是研究当时历史社会现实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王士禛;《分甘余话》;清代;史料笔记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6-0073-03

我们研究历史多依赖于正史资料,对私人撰写的笔记小说以及诗歌文集的引证不是很多。谢国桢曾说:“就正史言,‘前四史’和唐初官方纂修的《晋书》等还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和风俗民情的记载,但自宋代以后则只侧重于典章制度、政治沿革、帝王将相和官吏升沉的内容,所以要广泛地研究这些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就必须仰赖于能够较集中反映基层社会情状的笔记小说、地方志乘和诗文别集了。”此外,谢国桢还指出了笔记小说补充正史的作用:“野史笔记足以扩充历史的内容,增补官修正史的不足。”从上述引证可以看出,史料笔记小说具有很高的价值。这其中又以规模庞大的明清史料笔记尤为受研究者关注,清人王士禛的《分甘余话》就是代表作品。

一、王士禛生平

王士禛,原名士禛,字子真、貽上,号阮亭,又号渔阳山人,人称王渔阳。生于1634年,卒于1711年,享年78岁,谥文简。他原籍山东诸城,后祖上迁居新城,遂为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

王士禛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河南省布政使。士禛“幼慧,即能诗”,顺治七年(1650),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他喜交游,顺治十二年(1655),曾集诸名士于大明湖,赋《秋柳诗》四首,和者数百人,名噪一时。顺治十六年(1659),在扬州任推官时,“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常与宾客泛舟红桥平山堂,酒酣赋诗。后奉命入蜀、下南海,遇佳山胜水,名利古迹,必登临赋诗。康熙时,“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蔚:‘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蔚以士禛对。复问冯溥、陈适敬、张英,皆如蔚言。召士禛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禛始”。康熙帝还曾征集他的诗,得300首,名《御览集》。王士禛在当时声望很高,充当诗坛领袖数十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王五案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

(1710),康熙帝眷念旧臣,特召官复原职,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乾隆赐名士禛。

王士禛为官数十年,官至刑部尚书,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十分谙熟清代典章故实、朝野风气和各地风土民情,加之对诗文颇有研究,这也就决定了其亲身经历和感受之作《分甘余话》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二、《分甘余话》的成书原因、命名及版本流传

明中期开始,皇帝怠政,宦官专权,党争日益,国力大不如以前,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控制力大为减弱,封建统治的种种弊端开始慢慢显现,加之内忧外患共同袭来,对文化的严厉禁锢政策不复存在。此外,心学兴起,至私人撰修著述之风开始盛行。于是,士大夫们把对明政府关于前朝史书和本朝“实录”修撰的不满和对明朝内忧外患的担忧都一一的吐露出来。清朝建立,这种著述风气被承袭下来,同样影响着一代文人。王士禛就是受到当时社会私人撰述风气影响,又通过个人主观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分甘余话》这部上乘之作。

《分甘余话》即王士禛罢官家居时所撰。他在自序中说:“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叨冒尚书,年逾七袞。迩来作息田间,又六载矣。虽耳聩目眊,犹不废书,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又引《晋书·王羲之传》中与谢万书“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书名即取此意。

《分甘余话》保存较好,一直流传至今,并无严重散佚。康熙四十八年(1709)序刊本是本书最早的刻本,七略书堂校刊本和民国间的石印本均由此出。中华书局于1987年出版单行本,并点校。此次标点,以初刻本为底本,对书中引文有疑问之处均作了查对,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字;增加或改正的字加方括号,原刻错字仍予保留。另外,为了便于读者查索,还补拟了每条的题目,进行统一编号。

三、《分甘余话》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

历代笔记的“平实文字中,大多深藏着作者的学术智

慧和深厚的知识功底：它具有取材广泛、手法灵活的特点；它以相对凝定的视角，从点滴日常生活到学术研究再到典章制度，一一开辟具有风韵的学术和艺术天地，而这一切又大都标示出作者对过去和当下的生活世界的文化的深刻反省、思索和忠实记录，因此历代笔记往往具有回忆和纪实色彩”。作为王士禛闲居时的一部回忆性笔记著述，《分甘余话》中的很多内容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考察采访，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是研究清史的宝贵史料。

中华书局1987年版《分甘余话》点校本前言中评述：“《分甘余话》是一部记见闻和谈学问兼而有之的笔记……本书共四卷，篇幅不长，但记叙内容却极为广泛，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考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至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

典章制度是诸多笔记小说中涉及较多的内容，《分甘余话》也不例外。如卷1“清代视朝仪”条，就详细地介绍了清代皇帝临朝前后文武百官及外国陪臣所遵循的礼仪，从时间到规模，再到具体的上朝路线等礼仪约束，皆反映了封建王朝的封建礼仪统治，为研究封建礼仪文化提供了资料。又如卷2“三司史”条，论及唐代到清代三司史之职官的职能及变化。再如卷2“内升外升”条，讲清前期官员的升迁问题，为研究清代官制史提供了佐证。此外，卷3“满汉状元”条，记载顺治时科举分满、汉两榜，至康熙时不分满、汉，皆一榜。这条内容既反映了清代的科举制度，又反映了清朝前期满、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这些都对研究清朝政治体制、职官制度、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诗歌品评是《分甘余话》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王士禛是清初诗坛上著名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清初诗坛的领袖，他所标举的“神韵说”对清代的诗学有广泛影响。所谓“神韵说”，实际上是继承了唐司空图“自然”、“冲淡”和宋严羽“妙悟”、“兴趣”之说，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追求“色相俱空”、“天然不可凑泊”的境界。这些主张在卷2“冯班诋议严羽”、卷4“诗评”诸条中均有阐述。王士禛强调作诗要天然而有真趣，反对矫揉造作和一味摹仿古人。明代及清初诗人，凡符合其论诗主张和标准的作品，无论作者的名气大小，都充分予以肯定。如卷2“杨巍诗”条云：其“五言冲古淡泊”，“皆逼古作”，充分肯定其诗作的自然淡泊之意。又如卷2“宋元鼎诗”条、卷4“评邓汉仪诗”条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类似的条目还不止于此，这些都为后人研究王士禛的诗论主张和明末清初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参考资料。

字义辨析是王士禛作为文人在《分甘余话》记录中尤为特别之处。卷1“梁王吹台”条对于河南开封县东南梁孝王吹台——“繁台”的称谓由来及读音进行了考证和辨误；卷2“若干”条，则详辨这个词的出处、用法、意义和读

音；卷4“些字考”条对“些”字的梵语读音给予证实等。这些不仅仅是作者自己对字词考证的钟爱，也为古代汉语字词研究提供了实例。

社会风俗是诸多笔记小说的主要内容，在反映社会的同时，也在呼吁某种社会问题。如卷1“马吊牌”条中，作者披露了当时许多官宦子弟为玩马吊牌，不惜荒废学业、倾家荡产，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呼吁社会纠正时弊。其中许多风俗的记载也为我们追寻古老风俗文化、继承传统风俗提供了依据。如卷1“竹炭”条，就载竹炭的制法，已失。

《分甘余话》有关地方物产方面的记载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物种变迁。如卷2“台湾物产”条载：“台湾物产多异中土。按东郡太守孙湘南元衡《赤嵌集》所录有波罗蜜、凤梨、香果、菱子、刺桐花、番茉莉、铁树花、蝴蝶花树、昙花、午时梅、红绣球、黄美人蕉、迎年菊、石榴花、新妇啼等。”文中还详细介绍了这些物种的形状、颜色、味道、时令等特征，为研究台湾物种留下了参考资料。又如“广群芳谱所载异花”条记载了异花凡116种，条目举例了数十种异花，为后人研究植物学留下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治病验方是《分甘余话》中比较突出的一部分内容。如卷2“治腋气方”条、“治吐血方”条、“楸叶治疮”条、“治喉闭急症方”条、“治障翳及赤眼方”条、“治小便不通方”条，卷3“治足疾方”条、“治偏头痛一方”条，卷4“治痔方”条等，都详细记录了药方的内容和使用方法。这部分内容可以展现当时的社会医疗技术，对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及处方史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对现代医药学和疾病治疗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上述主要内容外，另有先世著述、地名考辨、文人轶事和古书藏佚等内容，《分甘余话》中都有详细的记述。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文献资料的重视，也从某些个人事迹的述写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之，《分甘余话》就如一部百科全书，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清代社会历史的资料全编。

四、《分甘余话》的不足

《分甘余话》除具有社会历史价值之外，也有不足之处。

首先，部分引文不明确。有的只记文献名，但没有详细卷次。如卷1“诗中酒楼”条中“《青箱杂记》云”句，又如卷1“瓜瓢黛色”条中“《画墁录》”句；有的只记文献作者或者说话人及言语，但不记出自何种文献。如卷1“诗意与古人暗合”条之“老杜诗‘白鸟去边明’；坡公诗‘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句；又如卷2“直呼名”条中“常有赠申一绝句云：‘草泽贤豪尽上书，奎章阁外即公车。我同渔父因衰老，独有涵光是隐居。’”等句。

其次，内容涉及封建迷信命数。这是大多笔记小说中共有的不足。也许是作者受到封建迷信的影响，也许是对

批判的“火”与“冰”*

——由张承志个案论当代作家如何确立批判意识

杨建军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在当代中国消费文化语境中,作家批判意识的弱化值得警惕。本文通过剖析张承志独特而颇具争议的批判意识,从批判者的站位、批判者的视域、批判中的对抗性与自审性、批判的价值追求四个方面论述了当代作家该如何确立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批判意识。

[关键词]张承志;批判意识;价值追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6-0075-03

批判性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批判性更是人类反对一切非正义、探寻真理的根本力量。可是,当我们注目中国当下文坛时,便发现一个惨痛的事实:作家创作中批判意识的弱化。批判性弱化已给当代文学结下了恶果,“在‘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写‘偷情’的‘新现实’中,‘符号’代替‘思考’,‘欲求’代替了‘需求’,‘身体’代替了‘精神’”。面对如此窘境,我们急需唤醒当代作家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批判意识。

要在当下消费文化对批判性弱化、异化、腐化的语境中,呼唤作家批判意识就必须明确批判者该如何站位,批判者应具有怎样的视域,批判中的对抗性与自审

性该如何把握,批判中的价值追求是什么。本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试图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选择张承志作为呼唤作家批判性的解剖个案,一方面在于这个作家从民间立场出发的批判意识曾给文坛带来过广泛的争议;另一方面是因为张承志的批判意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的发展变化为唤醒当代作家的批判意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当我们摒弃对张承志“宗教主义者”的静态本质化定义,将《心灵史》前后他的批判立场结合起来进行动态的考量时,就会发现他笔下的批判意识既滋生着偏激的荆棘,又燃烧着可以撷取的火焰。

张承志作品对时代批判意识的彰显,与他深入民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海外回族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XZW0043。

客观事物的夸张描写,以寄托个人思绪,《分甘余话》中不乏此例。如卷4“紫芝白芝”条中就写道:“芝有五色,然紫多吉祥,白多反是。”

《分甘余话》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许多记载不仅为研究清代前期历史特点,特别是研究当时的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

且可以为今天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所提供借鉴。《分甘余话》当然有它自身的不足之处,但作为保存清代前期史料的笔记佳作,只要我们在征引史料的时候加以选择,就能更好地发挥此书对于正史的补正功能和对现实社会的借鉴作用。

[注 释]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谢国桢:《清野史笔记概述》,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

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266列传第53),中华书局1977年版。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序言),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